

陷，精确地说，俄罗斯可以更适宜地被看作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联邦制。

无论如何，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制度结构、程序和协议是否充分证实一种联邦制的民主的身份。如同其他地方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联邦作为可以成功运行的统治的特殊组织形式，要求一套社会所持有的价值和信仰，其前提是理解差异中的统一是联邦制最好的反映。这是谈到联邦主义或联邦社会经常提及的内容。换言之，联邦制要容忍，也要求对联邦理念作出社会承诺，在这种理念中，地方特征要同时被维持在国家与地方范围内。如博杰斯（Burgess）指出的：

联邦制的天赋在于其能够无限地适应与调和竞争中的、有时是冲突中的在一个国家内带有政治突出点的异质组合。宽容、尊敬、妥协、讨价还价和相互再认识是它的秘诀，而“联盟”与“自治”并存是它的秉性。

验证基于“控制与平衡”的俄罗斯联邦理念的虚弱性是这样一个问题：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多数主义民主只有微弱的发展机会。如最近总统工作文件就俄罗斯地区问题直陈到：“俄罗斯需要创造一种能够坚持和刺激民主进程的环境，一种面向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民主学校。”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前苏联俄罗斯的联邦化，特别指出最初基于向民族共和国妥协建立联邦所产生的问题。第二部分认识和分析了与民主化和市场化同时开始进行的联邦国家建设所引发的紧张关系的主要领域。第三部分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认识联邦走向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前景。

从适应到边缘化

对联邦制的支持进展微弱，更多地归因于联邦主义的概念还象是民族共和国与苏联统治的那种受到蔑视的结合。如同前自治共和国一般被看作“苏维埃联邦主义的门面”一样，俄罗斯当前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只被赋予了在他们地区事务上很少的自治权，甚至远不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亚美尼亚或摩尔多瓦。在一些方面自治共和国更与“内部殖民地”的特征相似。

首先，作为自治共和国，在行政和文化事务上他们仅被给予有限的区域自治；当地的党和国家机器，俄罗斯人所占成分不定，只对中央的利益负责。当地的文化与语言权利受到严重限制，远超过加盟共和国，民族教育广泛地使用俄语。总之，民族共和国被施以广泛的政治与文化的俄罗斯化：在苏联解体前夕，将近一半的卡累利阿人和四分之一的科密人，乌德穆特人，马利人（Mari），卡拉什人（Karachis）和切尔克斯人象讲母语那样讲俄语。

其次，他们的经济停留在初级资源基地和核心依赖的状态。地区过度专业化的特点是与当地初级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当地区域经济的性质并造成远比加盟共和国程度严重的受到限制的和依赖性的开发。与经济殖民主义的形式对比，其结果是为了中央决定优先考虑的经济利益，民族共和国的资源被严重开发，通常还伴有远期的地方环境后果。

第三，作为这种地区生产的专业形式的后果，“受到限制的社会分层”在多数民族共和国刻下了烙印，在这种分层中土著人口大多集中在初级经济活动中，只有少量的土著人城市中产阶级。更专业的城市岗位倾向于由俄罗斯移民填充，移民的过程成为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因此，在每个民族共和国内，都存在着一种种族劳动分工，土著人口大多留在初级经济部门，反之俄罗斯人更可能在城市里的专业管理、技术和行政岗位上出现。结果是忽略中央对生活水平地区平等的承诺，地区间的差别持续了下来，一些苏联最低生活水平标准来自民族共和国。实际上，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现象仍在车臣、楚瓦什、印古什、北奥塞提、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埃（Mari-EL）、摩尔多维亚和卡尔梅克持续着。

在俄罗斯向国家地位过渡的时期（1990-1991），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联邦，重新调整中央和



民族共和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被它的国家建设者们耽误了。对于俄罗斯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来说，这样一个再次任命的联邦职位有许多吸引力。首先，在支持俄民族共和国自治要求上，叶利钦看到加强自己权力基础并逐渐削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位置的办法。于是叶利钦公开鼓励俄罗斯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声明他们作为政治实体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作为回报，一些民族共和国联合抵制戈尔巴乔夫 1991 年为保留苏联所做的最后一分钟的全民公决。这时民族共和国表现出对叶利钦和对建立独立的俄罗斯的支持。其次，联邦化提供了一个加快莫斯科所承诺的国家民主化的办法。1990 年左右，叶利钦坚持俄罗斯能够有效率地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下”重新构造国家。为此他请求民族共和国拿走“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独立”，这些话他在六个月后的一次讲演中再次强调。最后，一个联邦计划被看成一个避免俄罗斯瓦解的领土战略。凭借接受这样一条调和主义的路线，叶利钦不仅开始避免使中央变成正在上升的挫折与仇恨的焦点，而且实际上也试图转变对分裂主义的支持，后者阻碍了新俄罗斯维持疆域。

在向建立一个俄罗斯人国家的转型中巩固了民族共和国的支持后，关于主权的争论自然抬高了苏维埃联邦应该确切地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出现了。首先是 1990 年 11 月所谓的卢曼切夫计划。并不以民族原则基础的眼光看待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特别是其秘书，奥列格·卢曼切夫，提出替代建议：俄罗斯应该转向建立德国“兰德式”体制，在其中设置 50 个左右非民族基础的区域单位。这个建议的意图是为了保证地区间公民权利的平等，在一些公民地区仅凭种族身份将不能受到比其他地区多的特殊待遇。据此，前俄国 oblasts（地区）将被转化为共和国，确保公民们，不考虑他们的居住地，享有同样的权利。1992 年 1 月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采纳的另外的建议，支持在民族共和国和州之间作出区分，虽然象一个临时原则。它区分出那些共和国和建立在民族指标上的州，引起争论的是，他们应该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在联邦政体内拥有自动代表；而那些非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有权拥有自己的特权和规定自己的立法程序，无权拥有自己的宪法。

事实上这些建议反映的是民族共和国和非民族州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前者被取消特殊身份、只承认他们文化差异的卢曼切夫计划震惊的时候，后者被最高苏维埃的决定排除在外，事实上，决定造成公民分为两个阶级：生活在联邦里的公民（民族共和国）和不得不服从统一国家统治的公民（非民族共和国）。无论如何，民族共和国成功地占据了高地，部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初步行动，声明莫斯科已经正式忽略移交的自己的主权。由于担心分裂行为会随着莫斯科提出的任何取消民族共和国已经掌握的土地特权的宪法建议而来，中央变得温和了。结果只有 21 个民族共和国中的两个——鞑靼斯坦和车臣拒绝签署 1992 年 3 月的联邦条约。其后果是民族共和国被给予了一定范围的权力，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各州则没有这项保障。总之在这项方案中，地方与联邦的权力边界既未获明确界定，也未成为在一定范畴内普遍适用的权力。

随着进一步的关于宪法的争吵和修订，新的联邦条约在 1993 年 12 月成为俄罗斯新宪法的基础。然而新宪法被广泛认为在民族共和国内废除了许多原来联邦条约包括的自治权力。结果只有 21 个共和国中的 12 国选民在宪法全民公决中投了赞成票。

新俄罗斯宪法事实上并未达到许多民族共和国起初设想的主权范围。尽管宪法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第 4 款使其无效，该款保证俄罗斯联邦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就优先于分裂的权力。在这里，对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核心的打击是联邦宪法取消了民族共和国分裂的权力，如果他们希望这样，从联邦来说，这种权力曾在 1992 年原来的联邦条约中规定了的，但被中央主义者特别解释成如同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完整领土实体的废除。如同民族共和国所看到的，这是对民族实施基本权力的否决，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民族自决权是一项即使在苏联统治下对加盟共和国也在理论上注明有效的权力。



与后来现代民主制度中的联邦制相比，联邦宪法也违背了基本原则，中央当局不可能单方面重新解释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苏维埃宪法中，总统被赋予两项权力：司法审核权（这项权力可以暂停俄国各省执行机构发布的规定）和联邦与地方机构或联邦立宪议员间的仲裁权。实际上，一些民族共和国，明显地是巴什库尔斯坦、鞑靼斯坦、雅库特和土瓦，在采用他们自己的宪法的过程中已经声明他们本共和国法律的至高无上超越俄联邦法律，这侵犯了新宪法，新宪法禁止联邦内的共和国与州进入与国家基本法抵触的立法程序。

联邦政治和民族紧张关系

俄罗斯的转型是从最初声称构造一个分权的联邦转变到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联邦，但联邦权力对共和国和州广泛地失效造成逐渐破坏联邦稳定的威胁，抬升了分裂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尤其可以在三个不同层面的紧张关系中得到证实：联邦和民主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地方文化控制权和自治间的关系。

当俄罗斯声明承诺将把联邦建立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集体时，共和国却在指责莫斯科加强行使“中央的指令”。叶利钦于1993年10月解散议会和随后3个月取而代之的仅以总统命令统治国家的行为被地方各省广泛地看作是中央所承诺的联邦民主的软弱性的象征。可怕的是，俄罗斯，带着它具有历史传统的中央化的推动力，正滑回中央集权主义，联邦将只成为一个虚名。从另一面看，无论如何，集中化控制也是莫斯科对来自共和国和州的强大离心压力的回应。根据托顿（Talton）在关于联邦主义的具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指出的，在政治中，地方是以一系列指标（如种族、语言、经济发展）的差距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缓解紧张和不一致……要求不仅进一步承认差异和他们在不断增强的联邦化的复杂过程中的保护意识，而且更需要加强协调和系统内中央集权的强迫。”被托顿（Talton）清晰涉及的，如莫斯科事实上正是，“当差异占优势的时候，系统内的分裂主义潜力很大，而统一则将要求控制，以克服分裂的离心倾向和势力。”

如衡量重器一样，莫斯科的许多中央主义者呼吁建立一个“严厉的联邦”，民族共和国和州对中央有更强的依赖，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俄罗斯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行向市场所有制的转型。这个观点不仅由民族主义权力派，也由一些赞成民主制度的人向前推动，后者坚持只有中央施以更强有力的领导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实际上，在联邦政策的某些方面，为“控制地区民族主义”的中央建设战略已经出现。包括在民族共和国内通过提高俄语作为地区间交流因素的重要性重新强调双语制的必要。当然更彻底的是牵扯到强制措施的新设置。这包括对强硬的共和国实行具威胁力的经济制裁，最明显的是在1991-93年针对鞑靼斯坦，在共和国不愿签署新联邦条约的行为发生之后，武装当地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赞成联邦制组织对抗北高加索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为保证联邦的控制，中央愿意做到什么程度无疑表现在1994年12月决定派遣俄军进入分裂主义共和国车臣，这是自15年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没有先例的大规模军事干涉。

对具有当地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分裂势力敏感的中央，这时允许民族共和国在管理自己事务上比联邦其他州有更大的余地。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央对省级官员的任命上。与其他州级单位相反，民族共和国免于由中央执行机构强制任命只对总统负责的主要行政官员，被允许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体制和选举高级官员，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结果莫斯科表现出愿意实施一种不对称的联邦制形式，其中潜在问题最大的地方被自相矛盾地允许具有最大的弹性。在意料之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俄罗斯各州的辩驳不仅在于对这些州的行政人员的任命削弱了当地的民主自治政府，而且一种后果是与“享有特权的少数民族”相比，他们正



在被另眼看待。

无论如何，不考虑通过地区自治表现出的对民主的呼声，在民族共和国内部，一个错误的假设是民主必然在日程表上占据显要位置。如同其他地方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一个错误的论断是对地方负责的渴望自动地带来更大的地方民主。至此，在政治理论中不存在任何基础可以断言较小的领土单位必然更欢迎民主政治。在俄国及其各省，由于市民社会尚处在萌芽发展阶段，反对当地集权化倾向的力量是微弱的。这部分地表现于具有提醒意义的当地选举的低参与水平。在俄罗斯各州 1994 年的选举中，参加率如此之低以至于许多地方的结果被宣布无效，因为他们没能吸引必需的 25% 符合条件的选民去投票站。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如摩尔多维亚和卡尔梅克，服从权力的倾向已经明显。在这些事实上的主权国家，保守的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联末期掌权，能够为“半服从”的统治方式辩护，声称这可以在政治动荡的年代提供社会稳定和经济方向。进一步地说，这些政治领导人也希望并能够用打民族主义这张牌为他们的行为辩解，这些行为基于的逻辑是只有通过强大和团结的“地区国家”，地方利益才将受到保护，免于遭受来自中央和市场方面无政府状态的侵害。

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性质也是一种关键性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联邦的议事议程。特别是三个问题起决定作用。首先，存在一个地理经济不完整性。70 年中由中央领导的地区间的经济协调被各地独断专行的混乱所代替。从作为中央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开始调整被证明是极端痛苦的，作为中央计划的一部分，每个共和国和州被告之生产什么和市场在哪里都曾是有保证的。一种症状就是地区间贸易崩溃，地方生产的恶性下降更加重了这一点。为应付这种局面，各地倾向于追求自己的自身经济利益，包括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消费品出口配额。

其次，存在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水平上——中央、地方或大区，政治家们可以为当地成功地转向市场提供最有效的保障。在这方面，中央对地方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效的经济政策，包括在各州之间的商品供应与需求上尽量避免分裂的政策。实际上，1992 年盖达尔改革派政府时期是一个短暂的例外，该政府认为保证市场改革的关键就是经济分权化，这曾是一个来自中央的作用有限的方向。放弃这种向市场交换的转型意味着中央被民族共和国和各州指为无力为缩小经济分裂的范围提供有效的领导。这包括为中央明显欠缺有效实施市场改革的地方政策。

在地方国家（民族共和国与州）层面上，许多经济转变的最初行为正在发生。通过在政策上实行更大的控制影响当地经济，各地发现这样一种利用自己的资源重振本地经济优势的战略也是集权的。尽管这些政策与达到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承诺一路同行，但许多民族共和国的地方政治精英，他们懂得需要在进行结构调整和牢固维持其选民支持之间找到平衡，出于恐惧一个过于彻底的政策会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权威，他们抵制转变得太快。结果是许多地方领导人继续为他们的国有重工业要求最大限度的联邦政府补贴，延缓作出将导致工厂关闭和大规模失业的决定。并非巧合的是，那些人均联邦预算补贴率最高的共和国也正是那些私有化最慢的共和国。

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继续采取一系列更彻底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向着在全球经济中找到他们当地市场位置的目标采取一些量体裁衣的初步行动。卡尔梅克共和国处在西南部最边缘。为了摆脱作为俄共和国中最穷者和经济生存能力最低者之一的处境，卡尔梅克采取了一个市场自由化的长远计划，旨在改变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农业与其他初级生产的出口依赖型，通过建立一系列具有竞争力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变为更具经济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振兴计划欲通过免税的刺激依靠外来投资，以结束共和国对来自莫斯科的经济补贴的依赖。不过这也是一个在加强本国实力的想法下伴以承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其中保证经济增长优先于促进多数主义民主。

不是简单地追求“单个儿去干”，大多数民族共和国和州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大区经济发展合



作战略。这使得在共同的自身经济利益基础上构建一个地理经济力量集团成为必要。在现有的 8 个地理经济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西伯利亚协议，其成员包括了那里所有 19 个民族共和国和州。1990 年 11 月协议宣布生效后，它建立了一种协调该区域经济改革的办法，也提供了一种更强大的地域权力基础以确保利益共享，这涉及对当地巨大的自然资源库带来的财富进行更多的分配控制。1992 年 7 月，一个陈述地区组织基本原则的宪章被其成员批准。在承认其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莫斯科事实上做了铺路工作，不仅是为一个更有效率的“西伯利亚利益集团”，也是为沿着被西伯利亚协议接受的线索构造其他地理经济力量集团。尽管这个协议未能避免其内部的地区间紧张关系，最明显的是这些民族共和国中最大的和经济实力最强的雅库特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但协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向促进合作的方向取得进展，明显的是关于如何最好地利用西伯利亚未开发的物质潜力促进各地更均衡的发展和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将西伯利亚作为全球投资场所出售出去。

最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被财政联邦主义祸害了，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民族共和国和州应该为联邦预算做什么贡献，而这些预算资源该如何在分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被视作在财政收入上对穷困的地方要求得太多，而作为财政任务加重负担的回报，民族共和国和各州感到他们没有从联邦预算得到他们应得的公平的数额。由于大的数额需由联邦预算作出分配，争论在于，民族共和国和各州不得不砍掉许多必要的当地公共开支用作经济投资和社会福利，其作用如同刺激当地发展的刹车。

出现的一个特别的争论焦点是财政预算政策使得民族共和国和州之间不断加剧对供不应求的联邦资源的竞争。这种再分配政策给民族共和国带来的好处，看起来并未反映出对地区平等的认识或需要，反倒象是地理政治杠杆和地区游说的无效。实际上，那些在联邦开支中支付最少的民族共和国，得到了中央最大补贴的一部分。在 1992-1993 年间，各州的人均纳税总体上高于民族共和国，其中一些民族共和国，明显地是巴什克爾斯坦，然后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雅库特和达吉斯坦几乎根本没纳税。民族共和国也从预算分配中得到最多的好处，最显著的是科密和北奥塞提共和国。另外，除了 3 个共和国（摩尔多维亚、乌德穆尔特和楚瓦什）例外，所有民族共和国都得到了净补贴，同时 49 个州中的 47 个在税收上贡多获少。

关于文化权利的争论也正在影响中央和民族共和国的关系，民族共和国希望通过推广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宗教重新拥有他们的地方特性。宪法中关于这种权利要求的内容在民族共和国中流传广泛，在新俄罗斯，应该享有优先地位的“是个人和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还有，集体的权利，如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权利，其次重要。因此民族共和国对莫斯科关于一个联邦的俄罗斯的承诺始终怀疑，在那里，他们作为种族公民的权利未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民族共和国认为在文化上的不同是他们的权利，以制度确立这一点被解释成与一个联邦结构相悖。在这种结构中，一个强大的对地方无动于衷的中央可能热衷于通过再次制定俄罗斯化的政策重建自己的文化霸权。这种忧虑特别来自在民族共和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居民，以及担心这些当地俄罗斯人被再次利用为中央策划的俄罗斯化政策的代理人。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许多鞑靼人忧虑随着他们的政府与俄罗斯签署了 1994 年 2 月联邦条约，实际上结束了鞑靼斯坦为期 3 年的事实上的政治独立，共和国政治与文化的俄罗斯化的道路已经开放，而中心在于东正教和俄语的共和国五分之二俄罗斯人口的文化实践，可能为边缘化鞑靼文化提供一个建筑集团。

然而在推广当地民族文化上，许多民族共和国也被中央指控为采用过分突出民族主义特点的文化控制形式，甚至转向制造当地的民族阶层。这加深了土著民族与当地俄罗斯人的紧张，其后果是许多俄罗斯人，因恐惧他们的未来而大量离开。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少数民族共和国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建议界定当地公民，参加共和国选举的权利将只对那些属于当地土著民族的



人开放。在一些伊斯兰文化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对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恐惧也导致了当地俄罗斯人的忧虑，明显地是在穆斯林共和国巴什克爾斯坦和鞑靼斯坦，虽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然停留在当地政治生活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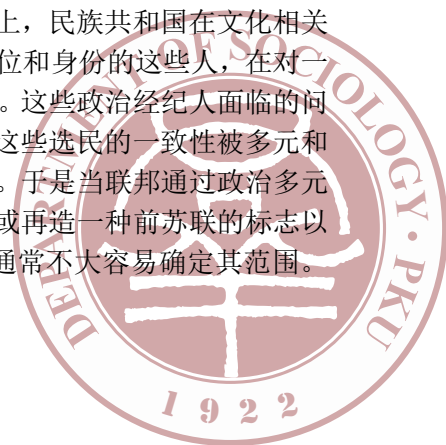
民族动员和分裂的潜力

联邦制不能解决但可以控制中央和民族地区的紧张关系，然而如在车臣危机和莫斯科对其的处理当中所充分显示出来的那样，对联邦制是否适合阻止俄罗斯的分裂存在着忧虑。不过经常被类似解释掩盖了的是分裂主义运动需要“资源”以确保民族动员。因此，按照资源动员理论的描述，仅仅是委屈无法构成分裂主义的充分条件。而且，为集体行动提供的政治机会也依赖于政治资源的有效性。根据我们的建议，4种资源可以被认作特别适宜发动和推进集体行动：政治机会结构、当地精英的角色、社区的意识 and 经济活力。

好的政治机会结构无疑可以为民族动员提供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米德维尔 (Meadwell) 的论述所揭示的，联邦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即联邦制度所包含的“制度能力”，显而易见的是一系列政治杠杆和接触资源的通道，这不仅更容易进行选民动员，也为分裂主义者大声发言提供了途径。结果是国家自身象一个共和国精英与中央的角力场。无论如何，如果通过加强对政治力量的集权化控制而刺激了冲动，随之而来的前景必然不是降低了分裂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基本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可能变得更有希望，因为中央国家限制冲动爆发渠道的做法更象是在做动员。甚至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分裂主义能够在民族共和国的层面赢得更多的支持，它依然能被一个愿意而且能够限制集体行动有效机会的强权国家“自上”地控制：归根结蒂，俄罗斯的前辈，那个苏维埃国家，在70年中成功地包容了其广袤的多民族帝国中的民族与地方差异。

对联邦使之生效的那些机会的利用主要是所谓的“民族经纪人”扮演了政治领袖的角色，特别是在联邦政治中他们被给予了战略性重要地位。现在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的人员结构上都有一个在最近这些年中已经变得更加有名无实的土生的政治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层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并非来自市民社会。这样尽管在 perestroika (“改革”) 时期 (1985-90) 这个精英群体在人员结构上变得更加土著化，但对个人来说它基本没什么变化，未受苏联解体的影响。这个政治精英群体也不得不限制他们自己在省级政治活动中的职业抱负，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在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区域之外的进步的机会。如果俄国将以带有更多西方式联邦制特征的方式转变，提供确保精英动员所必须的可能的机会结构，避免联邦丧失领导权也很重要。总之，目前“由于仍然没有有效的政党结构以将地方政治家的角色在国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大多数地方政治家……不受任何可以使他们遵守莫斯科的政策党的纪律的约束。”这样的精英群体自然倾向于从共和国的视角使用联邦政治的概念，为从联邦获取最多的利益而大量利用“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呼声。车臣是一个例外，它要求完全的独立国家地位而未获成功。

如果一种政治领导权是在民族自决的政体中使用的话，它要求一个文化特征标识更明显的民族共和国社区，更容易提出“民族”自决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共和国在文化相关职业里过份渲染拥有他们自己的有头衔的知识分子，获得相应职业地位和身份的这些人，在对一种以头衔为基础的社会身份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有他们特殊的既得利益。这些政治经纪人面临的问题是，作为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的潜在支持者，他们需要吸引选民，而这些选民的一致性被多元和瓦解的各种标志——语言的、宗教的、阶层和种族的，极大地削弱了。于是当联邦通过政治多元化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了资源的时候，社会和教育制度正支持重新发现或再造一种前苏联的标志以及实施“民族化工程”，这些支持旨在重新确定国家标识，这些标识通常不容易确定其范围。



长期的俄罗斯化模糊了曾经清晰确定的语言边界，同时对于当地劳动力的民族性区分的意识正在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苏联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上层实行本土化的结果。进一步地说，不仅由于 1917-1921 年间在一个更大的、民族混合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奠定了基础，这些有称号的民族无法回头以强大的身份资源，这种资源来自于原来关于前独立国家地位和政治主权社区的意识，动员它的人民采取集体行动。

种族性质也能够将动员的潜力非政治化。在一些民族共和国，特别是达吉斯坦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土著民族内部不一致，对民族和区域自决的不同理解分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其争夺对当地政治的控制权，一个无耻的中央可以凭借其优势利用这些作为其分化和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当地俄罗斯人的立场也很重要，在将近一半的民族共和国中（Adygeya、Buryatia、Gornyi-Altai、卡累利阿、Khakassia、摩尔多维亚、乌德穆尔特、科密和库雅特）他们占多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也有可观的规模（车臣、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是明显的例外）。尽管许多俄罗斯人支持当地自治，但在那些新近来到共和国的移民当中，当地身份意识还很淡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地的俄罗斯人更容易继续认同和支持他们地域上的家园——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这不仅因为从俄罗斯分裂出去将使他们的身份从作为多数民族的一部分变成少数民族，而且他们的民族权利、就业前景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挑战。这样在许多共和国中他们即使不是多数也是规模可观的，任何关于分裂的全民公决更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支持继续成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

最后，难以站住脚的理由是认为分裂将得到支持，而不需考虑对一个共和国来说经济上可能发生的成本。尽管民族共和国都没有一个“信息团伙”去关注非联邦制可能衍生的经济含义，然而他们对成本与收益的预计流程正在作出判断。在这个（民族共和国的）总列表的一端，是象卡尔梅克和土瓦这样的比较穷的共和国，它们仍然严重依赖莫斯科的大量经济补贴。他们经济依赖的本性和继续作为较大的联邦贸易社区的一分子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作为民族国家所需的更大而捉摸不定的经济支出更有价值。在另一端是天然资源丰富的民族共和国，如库雅特、鞑靼斯坦和巴什克尔斯坦。在这里，国家地位不太可能会导致它们在一夜之间成为“欧亚大陆的科威特”。即使在那些民族共和国中，一个潜在的分裂主义的领导层也将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去说服选民相信，相对安全的“国家”市场应该被在一个国际贸易体制中可能更不确定的市场位置替代。成为一个国际贸易集体的新成员至少在短期内必然带来一些经济的和社会的负面后果，如果民族共和国不愿意承受这些后果，更能接受的和更可能出现的办法是继续坚持一个地区主义的、而不是分裂主义的战略，同时坚持走自治道路，这条道路指引的方向是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

结束语

一个前集权主义联邦的未来基于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一起促进民主实践的能力。这要求联邦的制度、协议和程序要植根于民主实践，联邦主义社会基础没有得到发展的联邦是不可能兴盛起来的。为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而继续走向高度集中化联邦道路的，可能由重新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引起的中央的干预可能变得过分严重。到那时，可以看到，通过对他们地区主义的，而不是分裂主义的要求进行限制，民族共和国被授予一定范围的民族自决权，以避免联邦彻底失去这些有价值的成员。

（英文参考书目从略）

【译文选编】

